

小中华

意识的嬗变

——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

王元周 著



民族出版社

小中华

意识的嬗变

——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

王元周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中华意识的嬗变：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王元周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6

ISBN 978-7-105-12801-3

I. ①小… II. ①王… III. ①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思想史—研究—近代 IV. ①D829.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4590号

责任编辑：金 勇

封面设计：李 峰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780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314千字

印 张：25

定 价：30.00元

ISBN 978-7-105-12801-3/D · 2509(朝391)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朝文室电话：5813053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目 录

代序 中国历史学的周边视野	1
第一章 华夷观、中华秩序与小中华意识	29
一、华夷观与中华秩序	30
二、华夷观与朝鲜后期的小中华意识	43
第二章 北伐大义论与朝鲜中华主义	59
一、北伐大义论及其变化趋向	64
二、小中华意识的增强与北伐论的变化	70
三、小中华意识发展的限度	81
四、华夷之辨与义利之辨	97
第三章 历史、正统与大一统	101
一、编纂动机与正统认识	102
二、编撰体例与自尊意识	112
第四章 对清认识与宗藩体制的变化	121
一、对清认识的分化	121

二、朝贡制度的松懈	127
三、文人交往的扩大	136
第五章 从人臣无外交到人臣做外交	149
一、燕行与交游	150
二、燕行与开国论	160
三、从“人臣无外交”到“人臣做外交”	169
第六章 宗藩体制的礼仪体验与认识	171
一、燕行使的礼仪体验	172
二、清朝敕使的礼仪体验	183
三、礼仪的终结与历史记忆	193
第七章 中华主义、民族国家和世界秩序	196
一、李承熙的去国义理及在中国的活动	197
二、李承熙与李文治关于辛亥革命的争论	202
三、李承熙的共和政治论	216
四、变与常	225
第八章 儒学与国家关系的重构	228
一、李承熙与孔教	229
二、孔教与学校	232
三、新学与旧学	236
四、知识与道德	248
五、学校与选官	255

第九章 中国的历史记忆与韩国认识	258
一、认识途径与资料	259
二、“亡韩”与“韩亡”	268
三、殖民地近代性与民族主义	279
四、历史记忆与现实利害	288
五、“南与北：两个世界”	299
第十章 韩国的历史重构与中国认识	301
一、北伐论与相互疏远	302
二、北方领土意识与北方史观	305
三、从慕华到贱华	312
四、在野史学与民族史观的膨胀	323
五、历史重构与民族心理	332
第十一章 历史的共享与认识的共通	334
一、有关安重根的著述	335
二、国家间的竞争与暗杀	348
三、暗杀与义侠	353
四、民族国家与地域秩序	365
结 语	371
主要参考文献	377

代序 中国历史学的周边视野

——以亚洲史的沉浮为中心

在东亚近代历史学形成过程中，诞生于日本的西洋史、东洋史和本国史三分科体系对中国以及当时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等地有着很大的影响，韩国至今仍沿用这种分科方法。然而这种三分科体系在中国并没有能够固定下来。在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史发展较快，而世界史的发展相对迟缓，世界史中又以西洋史为主，而没有形成完整的东洋史体系。之所以呈现出与日本不同的发展路径，这自然主要是中日两国当时的国情决定的，因为日本的东洋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而发展起来的。除此之外，也有历史学学问制度、传统和人才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这里以北京大学历史系为中心，通过考察东洋史、亚洲史课程设置及演变情况，分析中国近代历史学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亚洲史体系方面所做的努力及所遭遇的困难，以加深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学学科体系演变过程的理解。

一、被忽视的周边

历史学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

到今天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也许正因为国史对民族认同的形成至关重要，所以在近代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往往对国史的重视程度超过世界史。齐世荣认为，严格说来中国有世界史学科是在1949年以后。对于世界史学科形成较晚的原因，齐世荣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国在近代大大落后了，失去了勇于吸收异域文化的雄伟气魄，因而对世界形势和外国事务茫然无知。^①这种解释似乎与事实不尽相符，因为近代历史学本身就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西洋史在近代世界史教育中一直占中心地位。如果说我们对外国事物无知，就历史来说更严重的也许不是对欧美列强的无知，而是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无知。1880年驻日公使何如璋致函北洋政府大臣李鸿章，建议清政府主持朝鲜外交，却分不清大院君李昰应和原领议政李裕元是否为同一人。^②郭沫若曾以韩国近代历史为背景写有小说《牧羊哀话》，对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深表同情，然而他对其历史其实知之甚少。1958年郭沫若访问朝鲜，在开城见到纪念圃隐郑梦周的碑，曾作诗以记此事，不意曾随志愿军在朝鲜工作过的李少一以为郑梦周是中国人，于是郭沫若也不能确定郑梦周的身份，就写信向朝鲜副首相洪命熹请教，又得翦伯赞和周一良的解释，才算完全弄清楚了。^③即使对于近代注意较多的日本，吕思勉回忆说：“还记得甲午战时，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日本在哪里，只约略知道在东方罢了……还有人说，日本兵到中国来，根本不知道地理的，都是李鸿章，把地图送给

① 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见《首都师范大学史学研究》第一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1页。

②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445页。

③ 《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三十三，1961年7月24日，截《北京大学学报》1978(3)，第14页。

他。”^①中国大学历史系纷纷开设与日本史有关课程也大多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

中国人对于周边地区历史的忽视，不是失去了自信心的表现，而恰是过于自负的结果。在中国还是亚洲的中心，可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时候，中国正史中也总是以“外夷传”的形式添入周边地区的历史。然而“盖中国之史，自为中国作，非泛为大地作，域外诸国与吾有和战之事则详记之，偶通朝贡则略记之，其他固不记也”^②，所以中国正史并不是将周边国家和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来认识的，而重点记载其与中国的交往。所以总体来说，近代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除去自国历史之外，对于别国的历史向来不甚注意。

到了近代，随着宗藩关系被列强所打破，中国人开始把视线转移到各列强身上，于是一部分人对西洋史感兴趣起来，而对于越南、朝鲜等周边国家，除了要以其亡国史来警醒国民之外，甚少关注。即使在近代新史学兴起之后，傅斯年依然承认：“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③王桐龄也曾批评说：“出洋留学之青年，研究历史者绝少，研究东洋史者几无。试问东洋三国，历史上有何种关系，大抵莫名其妙。至于日本之国体何若，朝鲜之国体何若，更非所知矣。”^④1928年戴季陶在

① 吕思勉：《蒿庐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第350-351页。

② 章太炎：《教学弊论》，见《华国月刊》1卷12期，1924年8月15日。

③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9页。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见《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桑兵：《四裔偏向与本土回应》，载《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0页。

④ 王桐龄：《新著东洋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4页。

《日本论》中也对中国人不愿意研究日本问题提出沉痛的批评：“‘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知识上的义和团’了。”^①

二、东洋史：三分天下而未果

中国大学开始注意到世界史教育并不算太晚。1898年梁启超所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即将“中外掌故学”作为基础课程之一。1902年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则以“中外史学”取代了“中外掌故学”，^②并对外国史进行了上世、中世和近世的时期划分。^③当然，这时期所说的外国史主要是西洋史，但亚洲史也略有涉及。如1902年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的考题中，除了有关于回教的题目外，还有东西洋历史比较的题目。^④1904年1月张之洞会同张百熙等厘定的《奏定学堂

^① 戴季陶：《日本论》，民智书局，1928年，第3页。

^②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538-567页。

^③ 有关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部分史实，可参考郭卫东、牛大勇主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初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9月。

^④ 题目是：“问：泰西史家谓国之能造文明极轨者，必海线延长而江河灌输，其说于古则征之希腊、罗马，于近则验之英吉利。然亚洲、南洋诸岛及高丽、南掌诸滨海国以便交通振古泊，兹未为上国，岂前例非欤，抑亦有他故也？”（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6页）

章程》将历史划分为中国史、亚洲各国史和西洋各国史,^①而《奏定大学堂章程》还计划成立与中国史学门相对应的万国史学门,其中还出现了以“世界史”为名的课程,作为经学科大学和文科大学中国史学门、中国文学门的补助课之一,而文科大学万国史学门则将泰西各国史和亚洲各国史作为主课。^②当时所理解的万国史概念大概与世界史概念相同,这时期京师大学堂聘请的服部宇之吉等日本教习就习惯称“万国史”,服部宇之吉强调“万国史非一国之史,乃国与国关系之史”,^③侧重世界历史的整体性。

这时期京师大学堂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有的也自日文教科书编译而来,如由上海普通学书室翻译出版的《普通新历史》则取自日本中等学校教授法研究会所编《东洋历史》。^④日人桑原鹭藏所著《东洋史要》也由樊炳清翻译成中文,交上海东文学社出版,民国后由金为重加翻译考订,商务印书馆将此书作为中学堂教科书出版。日本历史学的输入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历史学内部分科体制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⑤

①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567-578页。

② 《奏定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78-598页;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103页。

③ 服部宇之吉:《京师大学堂万国史讲义》,见《京师大学堂讲义初编二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④ 此书名为《东洋历史》,“虽称东洋史为亚细亚东半洲诸国人民盛衰兴亡之历史,实则全以我一国(中国——笔者注)为枢纽,其余皆附耳”(普通学书室编纂、周鹏校订:《普通新历史》增订,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凡例,第1页)。

⑤ 关于日本东洋史学的产生及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参见白永瑞:《“东洋史学”的诞生与衰退——东亚学术制度的传播与变形》,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五十九期,2005年9月。

这样，至少在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计划当中，不仅出现了“世界史”的名称，也同时出现了“西洋各国史”和“东洋各国史”的划分。但是当时京师大学堂并不具备开办分科大学的条件，仅开设了预备科、速成科和师范科，聘请江绍铨(亢虎)和日人坂本健一等讲授世界史课程，坂本健一的世界史体系对以后中国学者编纂世界史教科书有较大影响。1910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分科大学，但是只开设了1904年1月章程所规划的“中国史学门”，而没有开设“万国史学门”。

民国元年十月教育部公布《大学令》，1913年1月公布《大学规程》，规定大学文科历史学门之课程分为“中国史及东洋史学”和“西洋史学”二类，在“中国史及东洋史”类中有塞外民族史、东方各国史、南洋各岛史等课程。^①这时京师大学堂也改名为北京大学，并根据1912年和1917年公布的《大学令》逐步改组，到1919年改组完毕。然而在这期间史学门于1913年10月停办，到1917年秋才复设中国史学门。根据1917年12月北京大学制定的《本、预科改订课程一览》，史学门的课程已经分为通科(必修课)、专科(选修课)和特别讲演三类。在通科类中出现了中国通史、东洋通史和西洋通史的并列，在专科类课程中也有亚洲各国史、中亚细亚地理及历史等课程。1918年钱维骥(硕人)在北京大学讲授“东洋通史”，何炳松讲授“西洋史”，基本上形成了以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和东洋通史为必修基础课的格局。到“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史学门改为史学系，推康宝忠(心孚)为主任，

^① 《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1961年，第654页；《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令》，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增添西洋史各课，朱希祖称：“于是由一国的史学，而改为世界的史学。”^①1919年12月被选为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②曾希望能综合研究全世界的历史，通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和东洋通史使初习史学者得到全部人类有系统的史学概念，培养出一部分能专研究人类全史，以养成所谓世界史的学生。^③然而解放前北大史学系所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一直只有中国史和西洋史两种，而东洋史的发展相对迟缓。此时钱维骥已经离职，从“五四”运动后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除了断续开设过欧亚交通史、日本近世史、日本史、印度古代史、印度通史、朝鲜史、中西交通史、南洋史地和中亚民族史等与亚洲史有关的课程外，以东洋史或东洋通史为名的课程大概只有1929年至1931年间曾由王桐龄讲授过。^④王桐龄所著中等学校用教科书《新著东洋史》大概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几种东洋史通史著作中最具体系的一部。^⑤1950年北大史学系成立教学小组，当时也只有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和西洋史三个

①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见《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1929年12月17日编印，第70页。

② 朱希祖：1919年12月至1927年秋任北大史学系主任，1929年春至1930年底重任北大史学系主任。

③ 朱希祖：《新史学序》，载鲁宾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2页；《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三至十四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15，案卷号1919029；《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九至二十年度），《北京大学日报》，1930年10月16日。

④ 关于这时期北大史学系开设课程的统计，参见郭卫东、牛大勇主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初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9月，第34-40页。

⑤ 现在能够找到的东洋史著作除了王桐龄的《新著东洋史》外，还有傅运森所编师范讲习社师范讲义：《东西洋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2年）、赵懿年编纂：《中等历史教科书东西洋之部》（上海科学会编译部，1913年）、傅彦长著：《东洋史ABC》（世界书局，1928年）、张仲和著：《东洋近世政治史》（文化学社，1934年）、章赋浏编著教科书用：《东洋史》（世界书局，1935年）等。

教学小组。

不仅北大史学系如此，其他大学史学系的情况也基本类似，也同样只有少数教授开设过与东洋史有关的课程，而缺乏有系统的东洋通史基础课程。如武汉大学史学系到1932年无任何与亚洲各国历史有关的课程，^①此后在1934年的介绍材料中出现了郭斌佳讲授的远东近世史，以及陈恭禄讲授的印度史和日本史，陈恭禄并著有《印度通史大纲》。^②后来汪貽荪也讲授过日本史。^③但是郭斌佳是西洋史学者，陈恭禄是中国史学者，所以这些课程也不能经常开设。^④洪业曾在燕京大学历史系用英语讲授远东史，但是他所讲授的主要内容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也涉及英国，实际上是近代中英关系史，比较货真价实的亚洲史是翁独健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的亚洲史。辅仁大学史学系四年级开有东方史和中西交通史课程。^⑤方豪还在辅仁大学史学系讲授过南亚史（包括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和缅甸，以及南亚的印度）。^⑥解放前夕，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周一良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教授日文，还曾到北大兼授日本史的课。^⑦

1930年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课程表也将课程分为本国史、西

① 《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见《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编印，1933年1月，第43-47页。

② 《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见《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编印，1933年12月，第23、43页。

③ 《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见《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编印，1939年6月，第36页。

④ 1934年12月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就在学程介绍中说明本年度印度史不开（《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见《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编印，1934年12月，第28页。）。

⑤ 《大学部各科系课程表》，《辅仁大学》，1930年6月订。

⑥ 《本科学科说明·史学系》，见《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一览》，1947年度，第60页。

⑦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洋史和东洋史，以及通论与研究班四类，东洋史类中虽然不像本国史和西洋史那样设有通史课程，但是也列有日本史、日本近世史、朝鲜史、印度史、南洋诸国史、北亚史、回教民族史和欧亚交通史等课程。^①根据1944年编印的《国立中央大学概况》，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的课程除了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世史和西洋近世史每年必开之外，其他各教授每年开的课程略有不同。沈刚伯曾担任过中央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本为西洋史专任教授，但是也讲授过印度史。此外还有中亚史专家朱延丰和回教史专家纳子嘉。也许因为像沈刚伯这样的开设东洋史有关课程的教授本是西洋史教授的缘故，中央大学的东洋史课程附属在西洋史之内，在西洋断代史方面有亚非古国史，在专门史方面有突厥史、回教文化史。^②

三、亚洲史：重整旗鼓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不仅是一件政治大事，也带了学术思想、方法和制度的巨大变化。1949年春北平解放后，北京大学史学系等在北平的各院校历史系即开始讨论大学教育和课程制度改革问题。北京大学史学系、燕京大学史学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辅仁大学史学系、中法大学历史系，以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华北大学研究所等机构的代表经过5月

① 《课程及课程说明·史学系学程表》，见《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二种《文学院概况》，1930年，第49页。

② 国立中央大学卅四届学生自治会学艺部编：《国立中央大学概况：二十九周年校庆纪念》，国立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编印，1944年6月，第40-41页。

15日和20日在北大举行两次座谈会之后，决定成立北平新史学研究会。至于北平新史学研究会成立以来所追求的历史学的新变化，大概可以用郭沫若的阐述来加以概括。1951年7月28日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言称，中国史学界自1949年7月1日新史学会筹备会成立以来，实现了六种转向，其中之一就是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变到注重亚洲史以及其他各洲历史的研究。^①1954年郭沫若为《历史研究》杂志创刊撰写发刊词《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更为将来历史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提出汉族的历史、少数民族的历史、亚洲各民族的历史乃至世界史都需要我们以科学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和解释。

从大学历史教育现场来看，1949年9月14日北大史学系举行全体师生座谈会，讨论教学及开课等事宜，最后确定了本年所开课程，除了增加了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外，还增加了亚洲各国史。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问题受到关注，1950年10月25日北大史学系师生就曾举行座谈会，专门讨论朝鲜问题。受这一形势变化的影响，1950年11月8日北大史学系决定编写“中朝友好小史”及“美国侵华小史”。11月24日，北大史学系请周一良讲“中国与朝鲜的关系”。

紧接着，1952年进行了院系调整。院系调整之后，综合性大学和高等师范院校都设有历史系，对历史系的课程也实现了全面的改革。这次改革主要是学习苏联。当时许多大学都是按照苏联莫斯科大学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和教学计划设置专业，确定教学计划，建立教学组织。就各大学的历史学系来说，首先仿照苏联大学历史系的建制，专门设立了世界史教研室，树立世界史学科。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也因要对东方国家和地区输出革命，

^① 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载《进步日报》1951年9月29日。

开始重视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苏联科学院和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都设有东方研究所，出版好几种有关东方学的杂志。相对于中国来说，苏联对东方各国的研究较为先进，所以这部分也是当时各大学历史系学习苏联先进教育制度和教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2年秋院系调整以后，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实行新制订的教学计划。北大历史系动员懂日语等几门外语，讲授过日本史的周一良去负责组建亚洲各国史教研室。在周一良的领导下，迅速开出了“亚洲史”课程。1952—1953学年第一学期周一良为历史系三四年级学生开设亚洲史选修课，第二学期继续为四年级开设亚洲史选修课。自1953—1954学年第二学期开始，亚洲史成为三四年级必修课。1955—1956学年第二学期开始改为亚洲各国史，分为亚洲各国古代史、亚洲各国近代史、亚洲各国现代史，成为与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并列的专业基础课，学生在二三年级必修。1953年北大历史系规定自1953级新生开始历史专业和考古专业都改为五年制，自第三学年开始分专门化。《一九五三年历史系历史专业教学计划(草案初稿)》设有中国和苏联以外的亚洲国家史专门化，而1954年8月高教部颁发的《综合大学历史专业教学计划说明》也要求设立亚洲各国史专门化。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情况在当时各综合性大学历史系中还算是最好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也只有历史学一个专业，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教学小组，此后于1954年9月3日改组为中国史教研室和世界史教研室。^①到1955年又扩充为中国上古中古史教研组、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世界上古中世纪史教研组、世界近

^① 当时南大历史系还成立了中国现代革命史教研室，但是中国现代革命史教研室负责全校政治课，成员也都是政治课教师，只是设在历史系而已。